

学术前沿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FRANCE, MAY 1968

法国1968:

**终结的
开始**

Angelo Quattrocchi
Tom Nairn

安琪楼·夸特罗其 汤姆·奈仁 著

赵刚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学术前沿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FRANCE, MAY 1968

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

安琪楼·夸特罗其 汤姆·奈仁 著

赵刚 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 1968: 终结的开始/(法)夸特罗其, 奈仁著;
赵刚译.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7
(学术前沿)

ISBN 7-108-01532-3

I. 法… II. ①夸…②奈…③赵… III. 政治事
件-研究-法国-1968 IV. D75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340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

责任编辑 杜 非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5
字 数 135 千字 **图字** 01-2000-2278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15.00 元

学术前沿

总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素来重视国外学术思想的引介工作,以为颇有助于中国自身思想文化的发展。自80年代中期以来,幸赖著译界和读书界朋友鼎力襄助,我店陆续刊行综合性文库及专题性译丛若干套,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格局的急速变化,学术思想的处境日趋复杂,各种既有的学术范式正遭受严重挑战,而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关性则日益凸显。中国社会自70年代末期起,进入了全面转型的急速变迁过程,中国的学术既是对这一变迁的体现,也参与了这一变迁。迄今为止,这一体现和参与都还有待拓宽和深化。由此,为丰富汉语学术思想资源,我们在整理近现代学术成就、大力推动国内学人创新性著述的同时,积极筹划介绍反映最新学术进展的国外著作。“学术前沿”丛书,旨在译介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本世纪60年代之后国外学术界的前沿性著作(亦含少量二战前即问世,但在战后才引起普遍重视的作品),以期促进中国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反思,并回应当代学术前沿中的重大难题。

“学术前沿”丛书启动之时,正值世纪交替之际。而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历经百余年艰难曲折,正迎来一个有望获得创造性大发展的历史时期。我们愿一如既往,为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竭尽绵薄。谨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11月

1136 / 2

译注小记

我翻译这本书有因缘巧合的部分。今年二三月间我收到新左评论出版社寄来的新书目录，我订了几本书。书飘洋过海到了，然后我马上读了其中一本，也就是现在这本书，非常喜欢，特别是第一部分的叙述风格特别，给人很强的现场感和节奏感，加上这本书的两个作者都是感情充沛立场鲜明，睹其文如见其人，这些都让我突然发了翻译心。纯粹为了娱己，我翻译了第一幕，但一翻就翻下去了，想不但要娱己也要娱人。我想到的“人”自是关心台湾社会运动和文化变迁的进步的朋友。在翻译途中，偶尔翻到一些令人兴奋的段落，脑袋里都还会浮起我这些朋友的面容哩！想到他们也会喜欢看，想到他们也许在阅读的过程中有一些心得感触，想到如果还能促成一些讨论……只要想到这些，翻译的热度就下不来。

至于翻译这本书的非因缘巧合的部分，要怎么说呢？我想到汤普森(E. P. Thompson)对他的重要写作的缘起所做的告白，他说，他从不记得他“选择”做过这个或那个，他的学术实践都是受某种外在情势所召唤，摩理斯、布雷克要用他的笔传递一种浪漫主义的薪火，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

2 法国 1968:终结的开始

的英格兰工匠则要借他的喉诉说那几乎被布尔乔亚主流史学所遗忘的阶级斗争浮沉……。我之所以翻译这本书似乎也是一样，也可以说法国 1968 年的街头英雄要透过我的中文翻译让他们成为中文世界的集体知识与记忆的一部分；让他们的激进民主的梦想欲望与行动在三十年后，在遥远的台湾发声，成为社会运动的一个支援意识，成为“台湾人意识”的一个部分。**让 1968 成为“本土”的一部分！**

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学习到很多。我和大多数的台湾读者一样是法国 1968 年五月革命的门外汉（在美国读书，“六〇年代”是美国人权、新左运动的同义词），翻译中如果碰到陌生的字词典故，我尽量做些基本功，加上注解，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把翻译当学习，一方面则是希望能尽量降低读者的阅读困难。但限于时间和能力，疏失错误之处一定不少，尚请见谅。于治中、许莉青、张悦慈、朱元鸿、冯建三、侯念祖与小黑都曾提供音译上、资料上或是其他的帮忙；特别谢谢 Serge Dreyer，他以丰富的在地人知识，热忱地解决了很多我翻译上的难题。这些协助都大大减低了翻译的困难以及错误的发生，虽然他们对翻译之良窳不负任何责任。非常感谢于治中在百忙之中答应我的请求，在极短的时间压力下为这本书写序，帮助读者从更大的范围内了解法国 1968 的发生脉络和对之后的左翼思潮与政治所产生的冲击。

关于译注有四点说明：

一、由于第一部分以类似散文诗的体裁写作，所以我在

翻译时小心斟酌，除非必要，不敢妄动原作的标点断句，以期保留原文透过形式所传达的讯息。这点对于习惯中文断句的读者，可能不太习惯，请习惯。

二、凡是以阿拉伯数字作标记的注都是我下的译注。

三、人名与地名在第一次出现时会在中文译名之后附上原文，再度出现时则省略原文。原文有几处语言很精彩，如果翻译成中文就会流失原来的趣味，我也保留原文让读者自己品味。

四、年代都用汉字，例如一九九八，只有一个例外，即是1968，这一年用阿拉伯字书写是为了要凸显这是特殊的一年。

赵 刚

一九九八年九月于台中

序

我头一次读这本书是在1968年的秋天，算算也有三十年了，那时候它才刚刚摆上书店的架子，书页里头还兜着街堡战火的余温呢！两位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席卷全法国的大罢工正以风雷水火之姿前进。一千万人走上街头，其中有工人，有学生，还有专业人士，同一时期，英国学生也开始隔海唱和，质疑并挑战所在国的政治体系，那时候英国由威尔森（Harold Wilson）所主导的工党执政。

这本书是一份价值不凡的历史文件，记录了法国在1968年所发生的大事：一个西欧强权在二战之后首度到达人民革命的临界点。

要有两位不凡之士的两种政治立场的结合，才能有今天这本册子。安琪楼·夸特罗其（Angelo Quattrocchi）那时候是（现在也还是）一个才华出众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来自西西里，他生长在北意大利的科摩（Como），他父亲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在当地的学校任教。科摩并不是一个特有趣的地方，夸特罗其后来去了伦敦，打进了一些前卫艺术家和激进分子的圈子，在那儿结识了汤姆·奈仁（Tom Nairn），更重要的是，还结识了年轻作家兼小说家吉儿·奈佛（Jill Neville）。他俩坠

6 法国 1968: 终结的开始

入情网。此时,夸特罗其以其灵敏直觉侦测到东土有大事生,于是这俩口子就搬到巴黎,落脚拉丁区,等候 1968 找上门来。

汤姆·奈仁——英国人,苏格兰裔的社会主义者。在牛津念大学的时候主修的是哲学,但主要的兴趣落在美学,对意大利美学哲学家克罗其(Benedetto Croce)的传统尤其着迷。牛津毕业后,他跑到比萨的师范学校(Scuola Normale)念书,在曾是克罗其弟子的拉吉安提(Carlo Raghianti)指导下修习美学。在这里,奈仁从他的意大利同学处头一回接触到葛兰西的著作(那时英文译本还没出来),并且透过葛兰西认识马克思。不到 1968 年,他就彻头彻尾地变成一个葛兰西马派,毫无挂碍地运用这一派的语言来诠释当代政治及社会。这套路数和当时的左翼思想(试举几个名字:列宁、托洛斯基、毛泽东、以及切[“Che” Guevara])轧在一块儿,听起来是有些怪怪的。

从意大利回到英国后,奈仁透过密立邦(Ralph Miliband)结识了安德森(Perry Anderson)与布莱克伯恩(Robin Blackburn)。他们一伙人着手进行《新左评论》(*New Left Review*)的复刊。奈仁借机把葛兰西这个来自萨丁尼亚的革命家介绍给他的新同志们一起讨论。这个讨论的最大成果就是产生了一套关于英国历史的新提法,人称“奈/安德森”(Nairn/Anderson theses),这个题纲挑战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假设,也招来了马派社会史巨擘汤普森(E. P. Thompson)的赫斯之怒。两造之间的对话是英国左派同志之间知识辩论的范例之一,它达到的高度在当时并没有被两造身旁的好事者所跟上。★

★ 如今,这个辩论在一些学院派历史学者的历史书写里已经被扫地出门了。布劳克力斯(Laurence Brockliss)以及伊斯威特(David Eastwood)在他们

这本书分成两部，它们在语调和风格上容或有异，但在实质上并无二致，都充塞洋溢如火山爆发般的热情，抒发对未来的希望和乐观。那时候我们都笃信法国的五月事件是一个新世界的前锋。这本书的写作就是为了要唤起全世界的青年，把他们从沉睡中摇醒，激励他们走上自己的政治与社会解放之路。

彼时，夸特罗其在巴黎街堡里写作，一部分一部分的寄给当时在伦敦的奈仁，他这些既抒情又言志的散文诗是这个事件的当年最佳报道。这种笔锋燃烧着热情的战场报道，只有写作者亲临其境方能为之。这玩意儿是假不来的。

奈仁的论文部分则是写作于弘赛美术学院 (Homsey Art College) 为罢课学生所占领的期间中，那时候他在该校教社会学。我还记得，一个来自威尔斯名唤郝尔斯 (Kim Howells) 的年轻共产党员，是罢课行动的学生领袖之一，现在则是所谓的新工党 (New Labor) 政府的一员，忙着把梦想化作梦魇……唉，我岔开话题了。

奈仁的论文才情跃然纸上：脱缰纵横的乐观、锐利敏感、希望满满，对事件中各种派别以后走的路子尤有先见之明。然而，这里也有一个历史的讽刺。被奈仁痛批的一个托派组织——法国国际共党组织 (the French OCI) ——它的领

最近的一本通论性质的英国史著作《多种认同之结合》(*A Union of Multiple Identitie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里，把汤普森的〈英吉利的特殊性〉(*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 (1978) 这篇论文说成是当代历史有关英国国家机器性质这一问题的第一篇著作。(……) 怎么会呢？〈特殊性〉这篇论文是作为《理论之贫困以及其他论文》(*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Merlin Press, 1978) 的一章出版的。假如汤普森还活着的话，绝不会放过他们这种斯大林式的篡改历史行径。

导者在五月十日的晚上曾企图劝阻学生不要加入街堡斗争。这个组织的领导者之一是一个激越青年叫做乔斯潘 (Lionel Jospin)。我有些好奇,不知道作为法国社会主义党的一个领导者,当他在一九九七年被一波法国工人和学生的罢工行动拱上权力宝座时,他是否感受到一种历史的讽刺?这些工人和学生走上街头捍卫他们的福利国家和生活水平,令人想起三十年前的那个五月初夏。

这本书虽然写的是法国,但是 1968 的蜂起,既然也是受到越南农民史诗般的反抗所鼓舞,就不只是一个欧洲内部事件了,它席卷全球影响遍及各大洲。★但惟一立即可见的成功只有出现在巴基斯坦,仅仅是一个学生举事就引爆了扩及全国的都市动乱,在历经连续四个月的斗争和学生工人的巨大伤亡后,由美国所支持的军事独裁者阿亚布大汗 (Ayub Khan) 的政权终于被推翻。自 1968 年以来世事改变甚剧,苏联解体,接着而来的是粗暴的黑手党资本主义 (Mafia capitalism) 复出,这些都深刻地改造了这个世界,连**希望**也都,暂时吧,被放逐了。

作者之一的夸特罗其仍旧是一个“六八党人”(soixantehuitard)。他住在罗马和塔司卡尼 (Tuscany), 过着一个旅者的日子。他写了不少地下社会导游书籍以及民众生活手册,例如《小孩爱看电视,该怎么办?》。他也制作了两部有关六〇和七〇年代政治与文化议题的意大利语电视影片。世界在改变,人不堪其忧,老夸父不改其志,永远在抵抗与日俱增的文化市场化。

★ 关于法国 1968 对全球造成的冲击的讨论,请参阅由我以及华金斯 (Susan Watkins) 所著的 *1968: Marching in the Streets* (London and New York, 1998)。

夸特罗其从六〇年代就携手走过来的爱人吉儿·奈佛，去年过世了。在夸特罗其从巴黎战场上把手稿一篇篇的寄到伦敦（在那儿由一位叫做伽利欧[Carmen Callil]的澳洲小伙子快速校对，编辑成书交由豹书店[Panther Books]出版）的同时，吉儿正在赶一本小说——《爱苗》(*The Love Germ*)——由夸特罗其饰演剧中英雄。这本书现在也由新左评论出版社伴随本书一起出版。至于哪一本应该先读，当然取决于每一个读者个人的口味。我的建议是两本都要读。

奈仁把对葛兰西的不竭热情施展到他的一些作品，像是《着魔的玻璃》(*the Enchanted Glass*)，可谓恰到好处；他把英吉利君主制度解剖开来，展现这个制度如何塑造日后整个联合王国的文化。借这本著作，奈仁被视为当今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研究的世界级顶尖权威之一。他最近关于这方面的著作是《民族主义诸面》(*Faces of Nationalism*)，也可望今年由新左评论出版社出版。

重读《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把我拉回美丽青春往事，但我们不要忘记布雷希特(Brecht)的警句：“千万不要从美好的旧事物开始，宁可从糟糕的新事物出发。”我还记得《新左评论》的某一期里，奈仁对老工党发动猛烈的抨击。很久很久以前，作为一个左派如果还竟放话批评工党或工会里头缺乏民主，那可是大不识时务！但奈仁还是一如既往地朝工党开炮，指责工会历来进行的代表票(block vote)¹是“工党主义(Labourism)²的阴魂不散”。在新工党上台即将满周年的今

¹ 代表票是指工会或政党大会时，各工会的代表所投下的票并不等值，他的票值和他所“代表”的团体的大小成正比。

² 指受费边社会主义指导的英国工党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在承认资本主义

天,人们多么渴望能再度听到类似的狮子吼。我知道有很多人盼望奈仁开始转移注意力到当今变局的首要征候——那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当代文化与政治(甬提生活即政治[life-politics]那一套了)。毕竟,灰扑扑的历史法则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被击碎。

塔里客·阿里(Tariq Ali)³

伦敦,一九九八

生产方式和布尔乔亚宪政制度的前提下,透过政党和组织化工会,仅以追求具体劳工利益为目标,缺乏激进民主的想像。所以工党主义经常被视为“唯劳动条件改善论”。

³ 此人是作家兼影片制作人,写过四本小说,和十二本关于世界史和政治的书,是六〇年代英国重要左翼异议刊物《黑矮人》(*Black Dwarf*)的创刊编委,六〇年代运动的一个重要参与者,目前是《新左评论》编委。

五月的吊诡(中文版序)

于治中

我要这个世界
并且要它原来的样子
再一次地要它，永远地要它
我贪得无厌地嘶喊着：
重新来过
——尼采《善恶的彼岸》

五月，在法国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在1968年的五月，法国却突然爆发了它现代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一次社会运动，整个社会几乎到达了革命的边缘。在一个感受不到任何明显的政治或经济危机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却事前毫无任何征兆地发生了一场如此惊天动地的事件，完全超乎了任何人的想像，当然也包括了法国人自己。由于其影响既深且广，如今虽然已经历卅载，整个事件似乎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完全沉淀下来。相反地，随着日后历史发展的不同需要，一直反复不断地被讨论与诠释。

“68”已经成为近代法国社会的一项遗产，化作潜藏在人民意识层之下的一种“集体无意识”(inconscient collec-

tive), 不因意识形态的不同或党派的差异而有所区别。事实上, 我们更可以将“68”本身视为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 一直被压抑问题的一次无预警式的爆发。运动虽然迅速地结束, 可是所显露出来的症状, 如幽灵般长期缠绕着法国的社会。

事件表面的导火线, 源自于当时的大学生对整个高等教育制度的不满。六十年代, 法国的经济快速发展, 整个大学体系却相对落后。不仅硬体设施明显不足, 无法满足战后大量拥入高等学府的学生之需要。所传授知识的内容也无法跟上社会的脚步, 特别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生,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原则之下, 对大学教育变革的要求也因此格外强烈。

面对大学的保守、封闭与僵化, 学生的不满虽然一致, 可是由于各方的立场不同, 其诉求也各异, 甚至相互矛盾。一部分学生的愿望, 在于高等教育制度的现代化, 彻底改善学校的基础设施, 更新教学的方法与内容, 提供给学生一个自由、开放与完善的学习空间, 最终使经过激烈竞争挤入大学窄门享有受教权利之人, 毕业之后, 顺利的投入就业市场, 找到正式的工作。

另一批相对较激进的学生则与此完全相反, 并非仅在技术层次对当时的高等教育不满, 而是追根究底, 对大学本身的理念以及背后整个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质疑。这些人认为, 大学不应该只是一处职业训练所, 工作也不等于糊口饭, 生命更非意味着自私、自利、庸庸碌碌与自我压抑。这两种相互矛盾却又统一的观点, 相辅相成, 构成了 68 年五月学运最初发难的基础。

面对学生的诉求, 当时的法国政府非但未积极地回应,

反而粗暴地镇压，使得事态不断恶化。由于学生的组织行动得法，且议题切中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症结，以至于事件迅速地蔓延。在极短的时间里，不仅席卷全国的各大学，并且扩展至工人阶级，引发了全国性的大罢工，整个社会瘫痪与国家权力的暂时真空，最终导致内阁的更动，国会的全面改选与总理蓬皮杜的下台。

然而，如此巨大的一次事件，在持续近一个月之久后，却倏然地落幕。除了少数托洛斯基派与毛派团体继续坚持斗争外，整个社会又迅速地恢复了旧有的秩序。常态的政治活动重新出现，经济的齿轮也开足马力，再次高速运转，整个国家又被导致既有的劳动与休闲、生产与消费的轨道之上。

法国68年五月的学运，毫无疑问地与当时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相互呼应。无论是在波兰、捷克、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美国，青年人对现状的愤怒与反叛，成为一股无法阻挡的潮流。然而在法国，并且只有在法国，反叛不仅是青年人的，同时也是社会的。除了大学生外，参与的人从中学生、年轻的工人、技术人员，到中层干部、学院人士、知识分子、专业人士等，包括了社会各个不同的阶层，并导致整个国家权力真空与社会瘫痪几近一个月之久。

与其他国家的学生运动相较，为何法国的学生运动在时间上较晚，可是却更深入与更广泛地撼动了整个社会？图罕(Alain Tauraine)认为，这种独特的现象与运动最初的导向无关，因为法国学生的诉求基本上与其他国家的学生运动类似，主要的原因应与当时法国社会的特殊状况与国家所扮演的角色有关。

六〇年代，在阿尔及利亚战争后，整个法国社会积极地朝所谓的工业化国家迈进，一切以经济或科技的标准作为最高指导原则。增长不仅成为经济的鹄的，也变成社会与人文领域的共同目标。然而，工业化社会单面向(unidimensional)发展所存在的问题与矛盾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与此同时，大众传播媒体弥漫着一股标准文化，贩卖着幸福快乐人生的妙方。汽车、电视、度假、舒适、优雅……似乎唾手可得。自由、自主、自在、自足的日子有如近在眼前。一切的战争、社会冲突都烟消云散，贫穷的消灭、社会的不平等被扫除……仿佛人类终于在工业化的坚实土壤中找到了解决一切困难的依据，历史也终于越过了前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创伤。

在这巨大的反差中，法国国家的角色一直暧昧不清。从殖民帝国转型成一个所谓的现代民主国家的过程时，法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矛盾的综合体。它既中央集权，同时又结构涣散，既现代，同时又老旧，既伟大，同时又渺小，既自由，同时又威权……除了在国际上代表这块土地的住民以外，似乎并无法真正使人民对他自身社会的运作方式产生任何的认同。以至于当不满的能量积累至一定程度爆发时，因为国家是民主的，所以无法采用集权国家的方式，真正予以武力镇压。可是事实上，却又正是因为国家过于中央集权，不允许社会其他部门的自主运作，以致冲突不断发生与扩大。这与其他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在东欧，如捷克、波兰，在高压的政治下，学运可以迅速地及强力地被救平。在西方，由于大学制度基本上独立，以至于整个问题无法延伸至国家的层次。换言之，学生的反叛运动，在东欧，瞄准的